〈台灣佛教新史〉之十五——殖民時期本土教團的崛起（三）

闞正宗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本節來談談台南開元寺派崛起的經過。台南海會寺（即今開元寺）建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是在北園別館基礎上修建的「官寺」之一。

從最初延聘泉州僧志中禪師及其弟子起，開元寺傳承迄今不輟。但是，約在乾隆末年、嘉慶初年時，其法派卻從最初的曹洞宗轉為臨濟宗，可見其法派並沒有一貫。日本殖民統治之初，其門下僧侶到鼓山湧泉寺受戒，雖也受法臨濟，但與清代之臨濟宗派屬不同支系。

清末同治初年，原本出身台南大天后宮的榮芳和尚（達源，?-1882）赴大陸受戒，回台後住持開元寺，成為第 35 代住持。但開元寺未續延此一臨濟宗脈，榮芳和尚圓寂後，特別是進入日本殖民時期，由鼓山另一臨濟支派進駐，此派與台北五股觀音山凌雲寺派同出一源，乃衍傳至今。換言之，開元寺派的形成始於日本殖民時期，其派雖與北台灣五股觀音山派同一，但由於南北各自發展，故可視為獨立法派。

二、榮芳法師到鼓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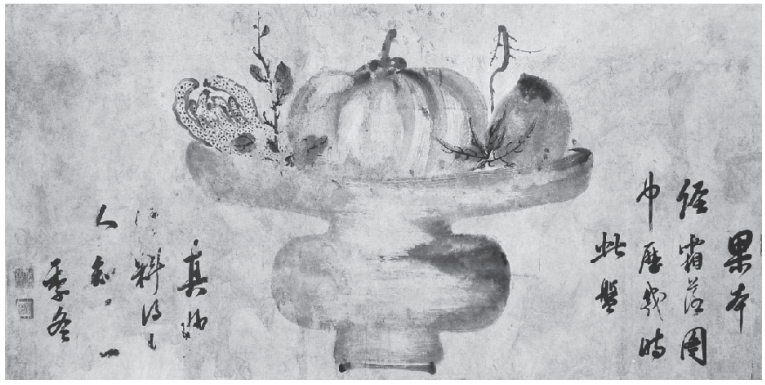
鄭卓雲的《臺灣開元寺志略稿》中，記載了榮芳和尚小傳：

> 榮芳和尚，字達源，臺灣鳳山縣人氏，生道光間。幼出家，詣鼓山受戒後到少林寺修禪學武，故精拳法、通禪理，武行僧技超異尋常。性豪俠，尤能書畫。前同治間歸臺，為開元寺住持，重修寺宇。…光緒壬午（8 年，1882）冬入寂。[1]

按清代鳳山縣下轄屏東，所以榮芳師實為屏東人，家族世居金葫蘆街，經營典當行業，店號大有。榮芳師十三歲時，即流寓開元寺，及長，赴福建鼓山剃度出家，研精佛學。[2] 榮芳和尚生於道光年間，受戒時間大約在咸豐、同治之間，此一期間正處於橫跨道光、咸豐、同治三朝（1851-1864）的「太平天國之亂」，而太平天國直到同治三年（1864）才土崩瓦解，故這一時期的榮芳和尚不可能到嵩山少林習武，習武地必屬於南少林系統，[3] 故才會說他研精佛學之餘「旁習技擊，及武行僧技，弄鐃飛環，超異尋常」。[4]

近代開元寺與鼓山湧泉寺的關係，比較能夠確定的就是自榮芳和尚開始。從〈天后宮鑄鐘緣起碑記〉得知，達源和尚是在咸豐八年（1858）5 月為大天后宮募鐘。[5] 榮芳（達源）募鐘後即到鼓山受戒，

1. 鄭羅漢，《臺灣開元寺誌略稿．沙門略傳》（手稿本、硬筆）（臺南：開元寺，1930），無頁碼。
2. 畸雲，《三六九小報．開元異僧（續）》（1930 年 12 月 9 日），2 版。
3. 關於福建南少林之位置，主要有莆田、泉州、福清三地之說。
4. 同註 2。
5. 鄭喜夫，〈清代在臺僧人錄（初稿）〉，《臺灣文獻》第 41 卷 2 期（1990 年 6 月），頁 127。



清代榮芳和尚畫作，台南開元寺藏。

根據《虛雲和尚年譜》得知，咸豐九年（1859）時，鼓山方丈妙蓮和尚曾開壇傳戒，[6] 這一年較符合榮芳到鼓山的時間。

榮芳受戒後，在同治年間回台，從他留在開元寺一幅畫的落款是同治四年（1865）來看，榮芳回台當在同治三到四年（1864-1865）之間。

三、日本殖民時期的開元寺與歷任住持

榮芳和尚於光緒八年（1882）圓寂，接任住持的是悟順來勝（第 36 代，福建興化人）。[7] 事實上，榮芳和尚之後，從第 36 代悟順來勝到第 40 代的義心禪師，生平都不詳，明確可知的是進入殖民時期的第 37 代住持寶山常青禪師。[8]

（一）寶山常青

6. 岑學呂、林遠凡，《虛雲和尚年譜和事蹟》（臺北：松山寺，1964），頁 5。
7. 鄭羅漢，《臺灣開元寺誌略稿・歷代住持》（手稿本、硬筆），無頁碼。
8. 王見川，〈日據初期的臺南開元寺〉，收氏與李世偉合著《臺灣的寺廟與齋堂》（臺北：博揚文化，2004），頁 204。

據鄭卓雲的《開元寺誌目錄》記載，榮芳達源之後至日本殖民初期的開元寺住持如下：[9]

第 37 代寶山禪師（台灣新竹人）

第 38 代妙諦禪師（台灣台南人）

第 39 代妙覺禪師（台灣台南人）

第 40 代義心禪師（台灣嘉義人）

第 41 代永定宏淨禪師（台灣台南人）

第 42 代玄精法通禪師（台灣鹽水港人）

第 43 代清源傳芳禪師（台灣台南人）

第 44 代成圓禪師（台灣基隆人）

第 45 代得圓印如禪師（台灣嘉義人）

盧嘉興在〈北園別館與開元寺〉中謂：「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臺灣淪日，寺產被人所強佔，與主持劣僧寶山互相交結將寺產賣與日人，因寶山先一日嘔血身亡，寺產得以存其半。」[10] 但事實上，寶山至少 1898 年還在開元寺（詳後），並不存在「先一日嘔血身亡」之事。

1895 年 9 月 4 日，日軍進入台南府城，海軍亦至安平，「臺灣民主國」亡。[11] 日本佛教各宗從軍僧（隨軍布教師）隨之進駐全台各地。而殖民初期的開元寺為日本曹洞宗所吸收，其中的關鍵者為曹洞宗從軍僧佐佐木珍龍（1865-1934）。

開元寺於 1895 年 12 月加入日本曹洞宗派下，翌年（1896）

9. 鄭羅漢，《開元寺誌目錄．歷代住持》（手稿本、毛筆），無頁碼。

10.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載《古今談》第 27、28 期（抽印本）（1967 年 6 月），頁 10-11。

11. 連橫，《臺灣通史．獨立紀》卷 4，頁 103-104。

7 月的盂蘭盆會時，住持寶山常青接受日僧若生國榮與芳川雄悟的指導，在開元寺改用日本式的施食法，平日則常穿著曹洞宗大本山管長所下賜的日式僧衣。由於寶山常青積極日本化，且常利用加入曹洞宗聯絡寺廟的名義巧取租息，被告至官方，責付芳川雄悟處置。[12]

寶山常青之後，開元寺住持依序是妙諦禪師（38 代）、妙覺禪師（39 代）、義心禪師（40 代）、永定宏淨禪師（41 代）。如果把寶山常青在 1898 年最後出現日期視為其卸任住持年代，到 1903 年玄精和尚返台接任開元寺住持，不過短短 5 年，開元寺卻出現上述 4 位住持，且前三代住持未見相關史料記載。

（二）永定和尚（1877-1939）

寶山之後的 4 代住持，依王進瑞編的〈臺灣佛教各大派演字法系表〉來看，是屬於臨濟宗派下 54-56 世的「妙、義、永」三代。[13] 永定和尚為台南西港堡塭仔內庄蚶寮人氏，生於 1877 年，1898 年禮義敏上人為師，1903 年辭退開元寺住持，前往大崗山超峰寺，但仍在開元寺任監院，協助玄精上人重修三寶殿。[14]

永定和尚於 1898 年出家後卓錫開元寺，到 1903 年卸任住持，可以說從妙諦禪師到永定和尚四代住持開元寺的 5 年間，僅是一個過渡期，或許是因為永定和尚不曾到鼓山受戒，所以很快就卸任。[15]

12. 王見川，〈日據初期的臺南開元寺〉，收氏與李世偉合著《臺灣的寺廟與齋堂》，頁 204-205。
13. 王進瑞，〈臺灣佛教各大派演字法系表〉，收在《慈恩拾穗——宏法寺開山二十週年紀念》（高雄：宏法寺，1976），頁 171。
14. 鄭卓雲，《臺灣開元寺誌略稿・沙門列傳》（手稿本、硬筆），無頁碼。
15. 同註 12，頁 206。

（三）玄精和尚（1875-1921）

寶山常青之後雖隔 4 代，但時間僅 5 年，之後由玄精和尚接任開元寺住持。玄精上人，字法通，姓蔡俗名漳，台灣鹽水廳布袋嘴人。生於 1875 年，相傳玄精「性俠直，精術法，善能隱身，移痣療奇疾，故世人咸稱蔡真人」。二十歲之後投開元寺圓頂，禮鼓山傳芳清公為師，尋往鼓山受戒。1903 年，任開元寺住持，在永定當家協力下重修三寶殿；1909 年因故轉錫泉州海印寺；1921 年示寂，世壽 47。[16]

玄精上人肖像暨題文

從榮芳之後有 5 年的過渡期，玄精這位人稱「蔡真人」的開元寺住持，展啟了開元寺近代發展的契機。

玄精和尚回台後，以奇門遁甲術數，加上為開元寺重建的努力，名聲漸熾，樹大招風的結果讓他捲入一起「詐欺」的官司，[17] 但此事與鄭卓雲在〈玄精上人小傳〉所說受「樸仔腳鄧平暴動事件」所誣累不同，[18] 最後在地方紳商的保釋下出獄。[19]

在疑似「不名譽」事件後，玄精隨即離開了開元寺，原本積極

16. 同註 14，無頁碼。
17. 〈僧人受累〉，《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8 年 8 月 28 日），4 版。
18. 同註 14，無頁碼。
19. 〈鯤南近信・沙彌留學〉，《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9 年 4 月 30 日），4 版。

募款欲修築前殿的工程也只好停擺，一年後，前殿已呈傾頹之貌，只好寄望日本官廳協助。[20] 開元寺群龍無首的局面必須等到 1913 年，從鼓山迎請玄精的師父傳芳和尚回台，開元寺從曹洞宗轉而加盟臨濟宗，新的階段才又展開。

（四）傳芳和尚（1855-1918）

傳芳和尚生於 1855 年，字清源，號布聞，台南市上橫街（石門腳）人，俗名陳春木。婚後遇開元寺榮芳和尚，遂萌出家之想。1881 年，得榮芳和尚介紹，投福州鼓山湧泉寺，禮惟修上人出家，得戒於怡山復翁老和尚。1913 年，應開元寺成圓監院之聘，回台接任開元寺住持。[21]

傳芳和尚

傳芳回到台南的時間，據〈貞女林氏妙緣齋行記〉載：「明治四十五年，傳芳和尚自閩歸臺，駐錫開元寺，妙緣為其護法，設立淨土會員如千數，贊助齋糧。」[22] 也就是說，傳芳和尚是 1912 年到台南的，1913 年才被聘請為開元寺「住持」，但由於傳芳歸化中國大陸，名義上不能出任住持，掛名住持的是成圓和尚。

20.〈南部通信・古寺傾頹〉，《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0 年 5 月 29 日），6 版。

21. 鄭卓雲，《臺灣開元寺誌略稿・沙門列傳》（手稿本、硬筆），無頁碼。

22. 羅秀惠，〈貞女林氏妙緣齋行記〉，收在鄭卓雲，《臺灣開元寺誌略稿・沙門列傳》（手稿本、硬筆）。林妙緣俗名林朝治，是臺南商人林文賢長女，4 歲時被當時開元寺住持榮芳和尚贊曰將來「必吾佛門大器」。30 歲母親過逝後，集眾創建慎德堂禮懺修行，1915 年 10 月往生。

1913 年出任開元寺住持的傳芳和尚，到寺第一件事就是傳授三皈五戒，時間是同年 10 月 14-18 日。[23] 之後，傳芳又陸續舉辦傳戒、浴佛法會，使得自玄精不名譽事件後消沉不振的開元寺再度重振，法務蒸蒸日上。

1916 年，台北圓山臨濟寺長谷慈圓（1880-1918）曾到開元寺拜訪傳芳和尚，勸請他到日本參訪臨濟宗本山，傳芳雖然心動，卻一直沒有成行。[24] 同年 11 月間，五股觀音山派脫離曹洞宗，[25] 開元寺派亦改宗臨濟，長谷慈圓為了表示對開元寺傳芳及凌雲寺本圓的禮遇，特別安排他們到大陸視察中國佛教，之後再轉往京都臨濟宗大本山參詣。[26]

他們於 1917 年 6 月來到日本，傳芳和尚除了獲頒《大藏經》、金襴袈裟及聖壽尊牌外，並見到岡田文相（相當於教育部長），獲其勉勵。[27] 之後一行人抵東京，還拜會了《大正藏》的主編高楠順次郎。[28] 從京都迎請的《大藏經》於 1917 年 12 月 16 日抵達台南車站，開元寺特別安排繞行台南市區，[29] 而聖壽尊牌的迎請，開元寺也是高規格對待。

開元寺因玄精事件之後數年不振，自傳芳於 1913 年任住持以來，傳了兩次五戒菩薩戒，從曹洞宗改宗臨濟，為開元寺的發展奠

23.〈開壇受戒〉，《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0 月 9 日），6 版。

24.〈諸禪師餞別會〉，《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3 月 27 日），6 版。

25. 日・增田福太郎，〈南島寺廟探訪記〉，收在《民族信仰を中心として——東亞法秩序說》（1942 年初版）（臺北：南天書局，1996 重刊），頁 226。

26.〈佛教徒送別〉，《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3 月 24 日），6 版。

27.〈文相諭遊歷臺僧〉，《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7 月 31 日），3 版。

28.〈南瀛詩壇・參觀東京帝國大學謝高楠先生〉，《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7 月 25 日），3 版。

29.〈恭迎藏經〉，《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12 月 14 日），6 版。

定了良好的基礎，傳芳功不可沒。1919 年 5 月 1 日傳芳和尚圓寂，享年 66 歲。[30]

（五）成圓和尚（1891-1933）

傳芳和尚圓寂後，最晚在 1919 年 8 月，成圓和尚實際上已成為開元寺住持，根據吳定甲〈祝開元寺成員（圓）和尚晉山式〉的詩得知，當時成圓 29 歲。[31]

成圓和尚掌握開元寺住持權力之後，第一件事也是傳戒，但與傳芳不同的是，成圓所主導的傳戒是四眾戒會，此次主辦還具有其他意義，即聖壽尊牌奉安三週年、延平郡王三百年祭。整個傳戒大會僅 7 天，自 1919 年農曆 11 月 11 日至 17 日彌陀聖誕止，稱為「水陸授戒會」，戒師有臨濟宗大本山妙心寺派代理梅山玄秀（主戒）、台灣布教監督山崎大耕（導師）、雪峰達本和尚（開堂）。[32] 四眾受戒人數 393 名，盛況空前。[33]

然而，1921 年 9 月間，成圓發生誘拐他人妻妾，並捲款潛逃事件，據載：「（成圓）拐帶人家侍妾以去，逃之南洋……得非義財約六、七千金，盡喪於商場中。」[34] 逃到南洋的二人，不滿一年就床頭金盡，勞燕分飛。最後成圓流落廈門，客死異鄉，時年

30. 〈赤崁短訊・住持圓寂〉，《臺灣日日新報》（1919 年 5 月 7 日），7 版。詩云：「四大本幻生，處處登聖名。寂滅性常住，體露徹底明。」

31. 吳定甲，〈祝開元寺成員（圓）和尚晉山式〉，《臺灣日日新報》（1919 年 8 月 9 日），6 版。詩云：「年數廿九修彌粹，世界三千闡入微。禪度澄宏歸統屬，和衷接眾莫睽違。」

32. 〈開元寺授戒會〉，《臺灣日日新報》（1919 年 12 月 8 日），4 版。

33. 王進瑞，〈開緣寺緣起に就て〉，《臺灣佛教》第 21 卷 4 期（1943 年 4 月），頁 30。

34. 黃臥松，《鳴鼓集二集・逐歸禿賊》，頁 30。

43 歲。[35]

1922 年元月，成圓被解除住持之位，他留給開元寺的財務虧空，與有辱佛門事件所引發的改革，都將由新任的住持得圓和尚承接。

（六）得圓和尚（1882-1946）

得圓和尚，字印如，俗名魏松，台南州新營郡白河庄馬稠後人氏。1882 年生，24 歲圓頂，禮玄精上人為師，翌年往福州鼓山受戒，得戒於妙蓮老和尚。歸台後，卓錫台南開元寺，歷監院職，1924 年接任開元寺住持。[36]

1921 年「成圓事件」後，得圓雖被召回開元寺「監管萬端」，但還不是住持或管理人，開元寺住持（管理人）從 1921-1924 懸宕 3 年，應該是「成圓事件」後不明事情真相的等待與信徒管理組織的角力所致。1925 年 4 月前後，得圓和尚才正式成為開元寺住持。

得圓和尚住持開元寺期間，除了重修山門外，還設立僧伽教育機構、獎勵後進留學、建彌勒殿與圓光塔、傳戒等，[37] 最重要的是他送門下兩位弟子證峰（林秋梧，1903-1934）、證光（高執德，1896-1955）赴日留學，而不是到鼓山參學，這是與日本當局及臨濟宗派直接溝通的考量，算是得圓和尚在面對寺內僧俗派系下的積極作為。

開元寺每年於農曆 11 月阿彌陀佛聖誕傳戒，是從傳芳和尚之後就形成的傳統，但得圓和尚 1925 年成為開元寺正式住持，時隔 8 年後，直到 1934 年才第一次傳四眾戒會。

35.〈臺南開元寺舊住持誘官家妾逃往南洋終客死廈門思明路煙館中妾早已溝水東西不知去向〉，《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5 月 17 日），4 版。

36. 鄭卓雲，《臺灣開元寺誌略稿．得圓和尚畧歷》（手稿本、硬筆），無頁碼。

37. 同註 36。

得圓和尚勇於任事，在他任內不僅擺脫「成圓事件」的陰霾，更將開元寺的法務推向高峰，奠定開元寺派在南台灣的地位。特別是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南台灣以開元寺為弘法中心，而開元寺也與日本臨濟宗本山積極合作，一方面強化布教方針，另一方面也朝弘法人才的培養規劃。例如 1930 年 3 月 3 日起，一連 3 年在開元寺舉行「臺灣臨濟宗發展策及各機關設立研究議案」；[38] 布教方面，1930 年 3 月 24、25 日兩天，以得圓住持為首，全寺僧侶十數人，配合日僧東海宜誠（1892-1989），在台南市溫陵媽廟、武廟、小公園作佛教通俗演講；[39] 僧伽教育方面，在會議不久的同一個月舉行第一屆佛教研究會，並在 3 月 30、31 日兩天，派往嘉義、員林等出巡迴演講。[40] 如此種種，使得開元寺地位日益重要。

殖民末期（1937-1945）的台南開元寺，之所以成為養成「皇國佛教」僧侶的重鎮，與它的重要性及腹地廣闊有關。比如，由南部教務所設立的「臨濟宗教師養成所」，於 1937 年 4 月 12 日起的兩個月間，就在開元寺召開講習會。值得注意的是，當年得圓和尚所培養的兩大留日弟子，證峰（林秋梧）早逝，證光（高執德）則成為開元寺甚至是臨濟宗

證光和尚（前排左四）1944 年晉山式紀念

38.〈臨濟宗各機關研究會議〉，《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2 月 28 日），4 版。
39.〈會事〉，《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3 月 28 日），4 版。
40.〈會事〉，《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3 月 31 日），4 版。

南部教務所倚重的弘法人才，一度擔任臨濟宗「臺南州本部長」。[41]

1943 年，得圓和尚將住持之位交給高執德，活躍於殖民末期至戰後初期的高執德所領導的開元寺，承當了殖民末期台灣佛教日本化與戰後去殖民化的艱苦任務，最後卻在光復後的「白色恐怖」中喪命。

四、結語

開元寺歷代住持皆來自福建名剎，直到清末同治初（1864-1865），才有台籍僧侶榮芳和尚到鼓山受戒回台住持。之後從傳芳和尚起，開元寺的住持人選就約定必須是傳芳派下門人。

進入日本殖民時代，開元寺的住持，寶山常青及以永定和尚為首的諸師暫時過渡後，進入玄精和尚以降的開元寺歷任住持，都有赴鼓山受戒的傳統。當時，台灣佛教在日本佛教帶妻肉食的氛圍下，戒律鬆散，開元寺僧受戒的堅持或許可以從兩方面解釋，一是維持中國佛教（特別是福建佛教）傳統；二是開元寺的信眾主要是以台民為主，日式佛教及僧侶不被接受。

殖民時期的開元寺人才輩出，從最早加盟日本曹洞宗，進而改宗臨濟宗妙心寺派，最後成為南台灣佛教的重鎮，足以與其他四大本土法派相提並論。台灣光復後迄今，開元寺派下門人在南台灣仍具有重大影響力。

41.〈臺灣南部教務所が臨濟宗教師養成所を開設臺南市開元寺で〉，《正法輪》860 號（1937 年 5 月），頁 26。